

# 後西方空間和社會學研究<sup>1</sup>

Laurence Roulleau-Berger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  
里昂高等師範學院

**摘要** 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知識的後西方空間。這是一種“全球轉向”，也是一種社會學方法論，它迫使我們替換、撤銷和轉變已有的理論和方法論路徑。就中國社會學和歐洲社會學在方法論上的世界主義——“斷裂中的統一和統一中的斷裂”而言，後西方空間正在從情境化的理論、方法論知識和多元化知識中逐漸形成。在這個後西方空間中，我們將要思考做研究的條件，思考如何製造生命敘事，如何將地方性知識和全球知識聯繫起來。

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知識的後西方空間。這是一種“全球轉向”，也是一種社會學方法論，它迫使我們替換、撤銷和轉變已有的理論和方法論路徑。就中國社會學和歐洲社會學在方法論上的世界主義——“斷裂中的統一和統一中的斷裂”而言，後西方空間正在從情境化的理論、方法論知識和多元化知識中逐漸形成。我們關心同時處於“壓縮現代化”<sup>2</sup> 情境下的各種非西方社會（比如中國一類的“轉型社會”）和西方社會體制；所以在後西方空間中，我們將定義一種類似於“關聯社會學”<sup>3</sup> 的方法論，它意味著可以聽到群體和個體更多元的聲音，尤其是底層群體的聲音，以此來闡明不同社會之間的動態混合和互動。我們將介紹一種可生產多元集體敘事的方法，這些敘事可以同時相對自主的



共存，或者相反，以互動或互鎖的方式存在。<sup>4</sup> 所以為了發展方法論經驗和特定區域和所有區域共用的方法論知識，我們將考察各種背景——這裏主要是指歐洲和中國中的道義經濟，它們的“自我”和個體化、文化傳統和政治結構。在這個後西方空間中，我們將要思考做研究的條件，思考如何製造生命敘事，如何將地方性知識和全球知識聯繫起來。

## 一 後西方空間與“關聯社會學”

正如烏爾裏希·貝克提出的，在今天和這個時代，在後西方社會學中我們在反對民族主義方法論方面所做的努力顯然是不夠的。社會學思維是與見證她誕生的西方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的。如果當代社會的多元化過程質疑社會是附麗于現代性，尤其是歐洲的現代性上的一種敘事的這種想法，那麼在這裏我們將運用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現代性理論，提出如何通向當代社會的多元敘事的問題。在這裏這種方法在其視域範圍之內被認為是試圖擺脫科學殖民主義和東方主義形式；消解“西方對東方的統治、建構和霸權形式”<sup>5</sup>。像哲學家Spivak<sup>6</sup>和歷史學家Chakrabarty<sup>7</sup>，已經在底層研究的框架下提出一些研究命題<sup>8</sup>，他們運用自己的特殊的動態系統來關注“庶民歷史”，將“歐洲地方化”，他們沒有借助歐洲作為理解的仲介，而是正視了不同的社會情境。後殖民研究主要是圍繞擺脫現代性的宏大敘事和將（後）殖民構想成世界性的社會科學的主導範式展開的。<sup>9</sup> 在這些研究方法逐漸“覺醒”的過程中，相關研究更多的集中在構想不同社會空間中連續性和斷裂性的形成方式，而反思多元的“地方性知識”的生產方法的研究則較少。<sup>10</sup>



在後西方空間中方法論空間已經接替了概念空間，為了借助“多元話語分析”通向多元性社會敘事，社會學家構想了時間、空間、背景和情境等田野研究的建構工具。<sup>11</sup> 因此，多點民族志變的很有必要，但是也並不排除定期在一個地方進行短期或者中期的調查研究。<sup>12</sup> 所以產生了一種依賴於競爭性的個體和群體對現代社會的多元性敘事，就像社會學家在研究過程中通過調試、賦予行動以意義鏈條對他們進行建構以及生產道義經濟。在這裏，知識的生產賦予社會學家和行動者協商能力，從而形成一種合作性知識，以及交換和分享的能力，並且以此修正和重新調試行動。更準確地說，它能夠讓我們掌握一種知識系統，即通過重新回到行動者的經歷和活動得以發生的結構基礎，來理解行動者在經驗性和實踐性參與中需要遵守的情境和互動語法。<sup>13</sup>

這也意味著社會學家需要自反性民族志<sup>14</sup>。Marcus也提倡運用多點民族志解釋多元區域情境中的聯繫、集合和重要的位置<sup>15</sup>。為此，他把世界體系轉化成一種參考框架而不是一種歷史的宏大背景，並主張在“淺描”和“深描”之間做出選擇。<sup>16</sup> 儘管作者最初主要關注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經濟的統治對象“屬下”/“賤民”主體，然而他隨後便建議擴大田野調查的範圍。Lila Abu-Lughod也建議採用“特定的民族志研究”來反抗文化主義取向。<sup>17</sup> 儘管社會學家的經驗是根據他們所研究的個體和群體的遷移、流動和移動建立起來，但是社會學從來沒有將他們自己限於“有限的田野”之中，而是在幾個“移動的區域”之間進行調查。<sup>18</sup> 社會學家可以通過社會學方法建構結構過程、情境和行動，這種方法部分依賴於多點民族志。雖然這個理論和方法論上的進步是很重要的，但是這些新的方法並不能完全取代闡釋過其他歷史背景的舊的調查方法。事實上，把關係，去區域化和集合作為田野過程的組成部分，就像囚禁、固化、隔離和沒有資格一樣真實。



如今，關聯的社會學是一種對它自身也有影響的選擇。這標誌著運用多點民族志和情境化工具來解釋都具有合法性的不同社會敘事中的集合與析取；也描述被烏爾夫·漢娜斯(Ulf Hannerz)稱之為“連續克理奧爾化”的現象。<sup>19</sup> 在這個例子中，世界主義方法論屬於實用主義方法論和批判社會學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種概念空間——就像 Luc Boltanski 所提倡的——在這裏，動態的和非等級制的社會背景、結構過程、個體和集體行動以及情境化秩序進行了結盟。<sup>20</sup> 概念空間被一種方法論空間所代替，為了通向多元性的社會敘事和多元性話語或者聲音，社會學家設想了一種有關時間、地點、背景和情境的多元建構工具。<sup>21</sup> 就像多點民族志是決不能與多區域分析混淆一樣，<sup>22</sup> 世界主義方法論也導致一種多情境面向，但是這並不是說一定要在幾個國家進行調查，而是可以在一個單一的問題設想之下，在幾個有差異的地區進行調查研究。因此，多點民族志變的很重要，但是也並不排除定期在一個地方進行短期或中期的調查研究。<sup>23</sup>

## 二 壓縮的現代性，信任危機與承認語法

張京燮已經對壓縮的現代性的種類進行了區分，是自反性的世界主義。<sup>24</sup> 壓縮的現代性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低度壓縮的現代性”，在非西方社會史一種“高度壓縮的現代性”，在像中國這樣的“轉型社會”中是一種“分化的壓縮的現代性”。

正如 Robert Castel 所展示的，<sup>25</sup> 在低度壓縮的現代性的西歐國家，我們已經從一種以互鎖的集體性結構為基礎組織起來的現代性轉向另一種由於福利國家的衰落和負責集體監管的機構受到侵蝕而形成的“無組織”的現代化形式；這再一次對經濟和社會團結，以及社會權利的獲得提出了質疑。畢竟，近幾年來，社會權



利獲得的不平等現象激增，“沒有權利或者權利”（‘without rights or entitlements’）的人也逐漸顯現出來，並且對民主原則提出了強烈的質疑。<sup>26</sup> 憲政國家和福利國家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尤其當福利國家由於動盪不安、種族歧視和削弱社會保障變得更加脆弱的時候。由於一種去集體化和再個體化的動態現象，個體的社會獨立性受到質疑，生產社會公民的集體規制系統也逐漸衰落。因此，在歐洲越來越多的移民、失業人員和年輕人生活在對政治和經濟失去信任的不穩定的社會情境中。

就中國的經驗而言，它意味著“分化的壓縮性社會”，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正在在積累的時期，李培林表示結構性變化的彈性仍然非常大，社會流動仍在繼續，但是對那些弱勢群體，尤其是對農民工和年輕人，中國社會正在生產大量的不平等和不確定的未來。<sup>27</sup> 對一個以市場經濟為主導整合方式的轉型社會而言，中國過去10年的現代化過程發展的非常快，但是也是在這個時候人口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形成了差距。結果是，在新經濟中窮人，農民工、年輕的失業者等逐漸被邊緣化，並且導致了信任危機。<sup>28</sup>

在歐洲和中國存在的“信任危機”問題，促使我們對社會中的社會衝突和社會信任的建構問題進行重新定義。事實是，道德崩塌和道德不信任已經滲透到社會互動之中，尤其在那些沒有辦法獲得一個社會位置和那些沒有社會位置的人中間更加嚴重。我們已經在法國和中國的移民、年輕的失業者中做了田野研究。<sup>29</sup> 因此，我們不得不面對已經出現在社會學家和大眾之間的信任危機。就像社會學家在研究過程中建構和調試行動的意義，生產道義經濟一樣，生產一種關於當代社會的多元敘事，依賴於競爭性的個體和群體。因為歐洲和中國的信任危機，知識的生產迫使社會學家和行動者擁有協商的能力，從而形成一種合作性知識，交換和分享的能力，並且以此修正和重新調試行動。<sup>30</sup> 更準確地說，它能夠讓我們掌握一種知識體系，即通過重新回到行動者的



經歷和活動得以發生的結構基礎，來理解行動者在經驗性和實踐性參與中需要遵守的情境和互動語法。<sup>31</sup>

在任何一個社會背景中都會遇到下面這個問題：社會學家如何進入他們的田野？他們與大眾之間的聯結只能通過“承認語法”來實現，承認語法在不同的國家之間並不相同……承認語法在不同的情況中是脆弱的，它的強度是不斷變化的而且可以在任何時候轉變成不信任語法。<sup>32</sup>但是在各種各樣的社會範圍內，從承認語法變成不信任語法的來源是很難比較和確定的。比如，沒有資格的田野是處處受到保護的，那些居住在那裏的人會一直看護它。此外，社會學家並不能夠自然地進入他們的；要麼是被介紹進去要麼他們知道這裏的規範而且能夠立即獲得“認可”。儘管如此，他們除了擁有一種並不能真正維護與行動者之間的穩定關係的社會和道德契約之外，他們仍然一無所獲。看起來越是容易“開採”的田野，比如住在郊區的工人階層和貧民窟……開放的邊界也越少，社會學家也越難和行動者建立一種社會和道德契約。在這種情況中，社會學家會遭受蔑視和質疑，動輒就必須盡可能快地說明他們為什麼在那裏以及他們的意圖。

我們已經注意到，我們要有能力與我們在調查過程中碰到的人建立一種可供任意支配的共同基礎。我們反對“方法論嘲諷”，它在其他地方被認為會生產一種同時性分析的學院知識，有時候甚至會改變普通社會成員態度。<sup>33</sup>比如，我們已經在關注中國農民工的承認需求和居住在巴黎、里昂和馬賽郊區的年輕的法國—馬格裏布的年輕人。因此，研究經驗框架的定義可以圍繞著道義經濟，<sup>34</sup>或者像信任、聲譽和關心這一類的道德和象徵商品的交易、流通和交換展開。當社會學家和行動者在田野內的認知分類和鑒別能力充分接近的時候，當共用知識和共用認同出現的時候，交易和交換行為就會出現。如果我們可以談論共用的經驗，當社會學家和行動者打算交換象徵符號以及共同定義它們



的價值的時候，在田野中或者說“在這裏”，問題的內容將與遠離田野時非常的不同。實際上，承認的模式需要參照不同的象徵秩序，確定用於交換的商品的價值是一項複雜的工作，因此為了定義它們的本質和評估“借貸”什麼，研究者必須證明他們的情境化能力。在碰到中國的農民工和地震的受害者時，要想知道在什麼時候和在哪種情境中給他們什麼或者與他們交換什麼，確實是很複雜的。

道義經濟的生產是研究者和他們在不同的社會背景和地方情境中認識個體的基礎，在那裏社會學家越來越需要獲得處在弱勢、貧困、遭受社會和經濟剝奪的大眾和社會的認可。因此要從比較的視角出發思考多點田野的多樣性，我們需要參照社會衝突的地區和獲得承認的要求，而且當我們發現我們自己處在沒有資格的、“自下而上遷移”的、弱勢的、受到歧的<sup>35</sup>、被隔離的……<sup>36</sup>的田野之中時，和Marcus所提倡的相反，研究者不能丟棄倫理責任。這個問題清晰地表現了對歧視話語的承認。田野中為了認同而進行鬥爭的情況越多，他們的倫理責任也就越多；當田野多元化時相應的倫理責任也會更多。情境中的社會、倫理、經濟和政治張力將會給研究者造成精神和道德負擔。

### 三 生命政治設施與私密政治

在民主的歐洲國家，個體化在當地司法框架中是受到成為自己這一禁令支持的一個新的公共政策口號。個體在不穩定的情境中，比如失業、難民和移民，會被分配到一些缺少法律保障的地區。為了獲得像就業和住房這樣的社會權利，這些個體需要在這個國家或者它的代表者面前展示他們自己，展示的內容涉及他們的生活，包括一些可能激發他人情感的一些私密的細節，甚至不



得不展示他們的身體。這意味著允許最脆弱的而且越發弱勢的人進入主流的競爭場域並且一直能夠留在這個場域中。<sup>37</sup> 今天，在西歐社會的公共政策——比如移民政策和僱傭政策中，表達成為自己這一禁令意味著，無論在僱傭市場還是在就業、住房和社會保障的公共政策的保障框架中，講述一個人的生命歷程都已經被強加了一種規範。在下面這兩個例子中，公共行動者在分化的社會空間中製造了關懷不同群體的道義經濟。歐洲的民主制度以多元主義制度和多元主義的生命政治設施為特徵。比如在法國，那些需要被關注的人包括失業者、年輕的無業人員、移民和難民，他們往往是被社會融合結構或者社會組織所接納。然而，中國的生命政治設施直接交付國家去關注農民工、失業者、“居無住所”的群體和愛滋病感染者等。這些“屬下”/“賤民”群體的聲音能夠被信訪部門聽到，它能夠將公民遇到的痛苦的經歷和不公正公之於眾。這些設施在歐洲還遠遠不夠。中國人在政府的組織框架中生活的很好。

生命政治設施建立起來並且控制個體的意向和行動，使他們能夠生產與制度規範一致的認同敘事；這個成為自己的禁令和服從國家的雙重過程被描述為一種“主體化和服從的雙重過程”。<sup>38</sup> 成為一個主體的要求在歐洲和中國呈現為一種生命政治規範。身體治理和主體性在中國和西歐是道義經濟的一塊重要基石。因此，主體性已經被馴順，在社會、政治、經濟方面也已經被工具化。不同類型的社會群體為了獲得被其他人所控制的道德自主性而鬥爭和對抗。個體需要展示出一種自主性意識，才能在不同的社會情景中進行自反性的思考和行動。當允許以治理主體性和馴順個體自我的方式重建自尊，這些情景就會出現。那些贊同這種情境的人必須進入一種個體間相互競爭的社會制度才能被允許獲得合法的道義經濟。在中國，在經濟取得巨大發展的背景下，個體需要不斷的強調他們的自主能力和進取心。比如，隨著工作狀





況的惡化，對於近來有資格的年輕人來成為自己的禁令清晰地表現為一種規範。

所以，對社會學家來說，什麼是私密政治？當重構傳記的時候研究者如何通向個體自我？在允許治理主體性和消除個體的“自我”的各種重建自尊的社會規劃舞臺中，個體必須表現出自主性，行動和反思的能力。為了進入合法的道義經濟，個體不願他們自己簽下這些規劃，並被迫進入競爭性關係和個體間的競爭。在這裏，個體需要忍受成為他們自己和捕捉主體性的雙重困境的約束，這兩者之間的鴻溝使得個體很難獲得“自我”。因此，社會學家也面臨著一個雙重情境的約束：一方面在調查中我們不可以參與到這個捕捉主體性的過程，另一方面如果他們不能接近個體，相互認同就不可能出現。比如，在移民、沒有資格和受到歧視等的底層田野中，只有當研究者和行動者共同生產一種道德經濟的時候——即研究者願意抒寫他們的認同和意義的需求，行動者願意認可這種根據身處的情境和政治、社會背景而生產一種不同強度榮譽體系的道德和政治能力，有關消失的人群和“屬下”/“賤民”群體的田野工作才能夠展開。<sup>39</sup>

當個體和群體的生命線交匯的時候往往是複雜的，研究者通常會面臨一種自責的感覺，因為個體經歷並不總是可見的或者可以描述的，因此，生命敘事在某些情況下會給個體製造一種羞愧感，由於太接近那種情形以至於敘事變得不切實際。傳記訪談不可避免的會重新揭開一些傷痛，再次點燃過去的苦難。比如，我們2013年在四川做震後生活的田野研究的時候，對受害者做傳記研究確實很不得體。在實踐中，集體和個體傳記並不一定考慮到敘事協議，所以創立一種重新定義敘事協議的方法論視域，創造一種也允許個體一起重新定義敘事協議的方法論規劃變的非常有必要。通過加倍努力瞭解敘事決定了什麼而不是敘事被什麼決



定，也就是說去瞭解敘事如何建構過去和未來，這一想法就會實現。通過創造一個使個體免受他們遭遇到的情境、損傷和苦難等太過消極的影響的保護空間，就能夠建構一種有利於保持自我的視域。比如，為了避免年輕的失業移民的生命敘事，因此我們提倡對個體進行城市敘事；<sup>40</sup> 我們會要求個體帶我們去他們敘述中有過工作經歷的地方。因此城市敘事變成另一種生命敘事形式。在國外的田野中，政治和當地的限制不允許一個國外研究者跟著土著民獨立行走，因此他們的方法論計畫的精密性是受到限制的。同時，城市敘事既可以是個體的也可以是集體的。此外，個體和集體敘事也參照不同社會背景中的個體觀念。

#### 四 多點民族志與敘事協議 (pact)

複雜的社會生產出的多元集體敘事既可以相對自主的存在，也可以以相反的方式，即交織或組裝在一起。當代社會的敘事和個體生活敘事越來越考慮到它們的動態性和複雜性。生命敘事揭示了社會中的並置和重迭，以及文化背景，並且為通向多元的集體敘事提供了一條通道。例如，我們知道在歐洲社會和中國社會都非常活躍的個體化過程以傳記變化的增加和情境的扭轉為特徵。個體傳記的建構與空間制度中空間流動形式的改變相關，同樣，在經濟制度中與職業流動形式的改變相關。與缺乏保障、受到歧視和被隔離的人口相關的歷程中，“傳記中心” (biographical crossroads) 重複著上述的規則。<sup>41</sup>

伴隨著壟斷，傳記變的世界主義和複雜化，不僅形成了以不同情境為基礎而且形成了以多重的時間和空間情境為基礎的多元認同。分化和個體化的過程協助生產了一種多元的和多樣的複



雜的職業生涯，並且正在代替以連續性和穩定性為基礎的生命敘事。城市的居住者，尤其那些弱勢群體，不得不使他們自己適應一個多元的新的，時常重迭的工作情境，那是難分類的，也很難把一個城市的行動轉移到另一個城市；結果是，他們在城市中需要採取一系列不同的認同。它的分支在空間的連接和職業流動中被組織起來。

隨著遷移的加劇，對新移民的描述<sup>42</sup> 確實象徵著構想一種新方式去定義“多元性傳記”，<sup>43</sup> 這意味著發展方法論理論需要把握多點的個體和集體傳記中的多元空間性和多元時間性。地點和事件（戰爭、失業……）的每一個變化都會對個體和集體重組以後用來補充社會地位、地點和個體認同的資源的保留劇目產生影響。連續的交匯點和新的傳記中心——尤其對移民的生活而言，起源於不同社會中工作的結構化過程和不同類型的社會群體和個體的行動、遷移和流動能力。<sup>44</sup>

對社會學家來說，即便採用了多點民族志，在運用了傳記敘事框架的經驗材料中，也很難捕捉到這些交匯點。越來越少的學者以一種相對線性的方式理解傳記敘事，相比之下，他們更願意採用把多樣的時間和空間聯繫在一起的雜亂的序列的方式。對社會學家來說，問題變成了把合取和傳記的斷裂的意義帶回分析的中心。顯然這意味著思考經歷和背景，同時又要避免把情境化的經歷還原成一種置身事外的決定主義<sup>45</sup> 那麼問題變成了：什麼造成了斷裂？什麼造成了連續？為了回答這些問題。社會學家將結構化過程對斷裂和連接的建構施加影響的方式，和個體賦予它們的意義納入考察的範圍。因此，研究者需要生產一種能夠重構多重情境中動態的移民個體和群體經歷傳記的方法。例如，在他們的空間流動和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中對他們進行追蹤調查，這也就是“多點民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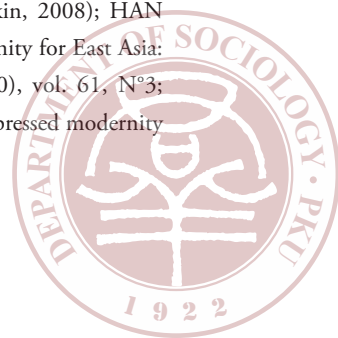
## 五 結論

我們將會把學術研究中的地方和國際維度作為我們分析社會背景在地方的研究情境基礎上生產的方法論理論影響的一部分。然而，我們也會分析不同的知識背景中與研究方法論相關的跨國流動，也會考察涉及社會學知識生產和研究實踐中的文化多樣性過程。只有當這些等價關係已經建立起來，並且表現的相對穩定；同時，以指導學術研究的共同制度和規範為基礎的框架也已經付諸實踐，理論、知識和方法才能相互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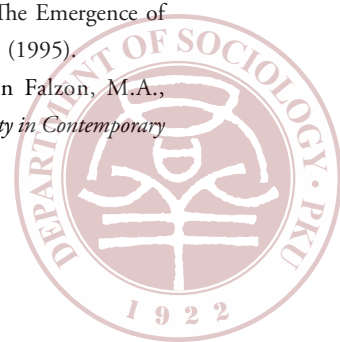
學術知識生產的創新是一個永恆的問題。然而，在社會科學和人類中，它卻很少以理論化的方法論知識的形式出現。在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中，只有社會學家專注於調整田野研究的方法，並且將理論化的方法論知識定期進行檢驗。作為一個社會學家，工作的困難在於當面對不平等和社會不公正的巨大張力時，就像會被不同的意見、衝突以及社會、經濟和政治張力分裂一樣。這些情景迫使社會學家發展新的方法論知識，從而生產一種學術方法和新的研究情形（也就是說研究者和主體之間的關係）。在這些非常不同的背景中，實踐中獲得的社會學知識，回應了與社會學家自己的社會經驗中相似然而卻是“情境化”的問題；此外，我們將來也會提出有關社會學知識普遍價值的問題。

## 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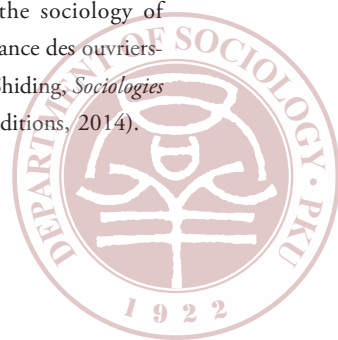
- 1 原文為英文。由任劍潤譯成中文。
- 2 LI Peilin, LI Qiang, MA Rong (dir), *Shehuixue he zhongguo shehui, Sociologie et sociologie chinoise*,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Pékin, 2008); HAN Sang-Jin and SHIM Young-Hee, “Redefining second modernity for East Asia: acritical assessme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0), vol. 61, N°3; CHANG Kyung-Sup, “The second modern condition? Compressed moder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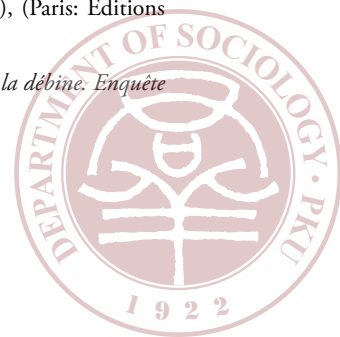
- as internalized 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0) vol. 61, N°3.
- 3 我們受到了 Sanjay Subrahmanyam 的《關聯的歷史學》一詞的啟發。
  - 4 ROULLEAU-BERGER, Laurence and LI Peilin, *European and Chinese Sociologies. A new dialogue* (Brill Publishers, Boston & Leiden, 2012).
  - 5 SAID, E., *L'orientalisme*, (Paris: Seuil, 2003).
  - 6 SPIVAK, Gayatri C., *Les subalternes peuvent-elles parler?* (Paris: Ed. Amsterdam, 2009).
  - 7 CHAKRABARTY, Dipesh,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8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9 BOUBEKER, A., *Les mondes de l'ethnicité. La communauté d'expérience des héritiers de l'immigration maghrébine* (Paris: Balland, 2003).
  - KILANI, M., *Anthropologie. Du local au global*, (Paris: Armand Colin, 2009).
  - 10 ROULLEAU-BERGER, Laurence, *Désoccidentaliser la sociologie: l'Europe au miroir de la Chine, La Tour d'Aigues* (Ed. de l'Aube, 2011).
  - 11 XIE Lizhong, *Zouxiang Duoyuan Huayu Fenxi: Houxiandai Sichao de Shehuixue Yiban*, (*Towards a Pluralistic Discourse Analysis: The Implications of Postmodernism Theory for Sociology*) (Beijing: Chinese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9); XIE Lizhong, *Postsociology*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2012a); XIE Lizhong,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Analyzing the New Deal for Exampl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b).
  - 12 WEISSKÖPPEL, Cordula « Traversing Cultural sites: doing ethnography among Sudanese Migrants in Germany » (2009) in Falzon, M. A., *Introduction: Multi-sited Ethnography: Theory, Praxis and Locality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Ashgate, Farnham, Burlington.
  - 13 CEFALÌ, Daniel , *L'enquête de terrain* (Paris: Ed. la Découverte, col. “Recherches”, Série Bibliothèque du MAUSS, 2003).
  - 14 BURAWOY, Michael. “Revisits: An Outline of a Theory of Reflexive Ethnograph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2003), 645–679.
  - 15 MARCUS, G.E.,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1995).
  - 16 HANNERZ, Ulf, “The long march of anthropology” in Falzon, M.A., *Introduction: Multi-sited Ethnography: Theory, Praxis and Locality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Ashgate (Farnham: Burlington, 2009).



- 17 Lila Abu-Lughod, Writing against Culture, In: Richard G.Fox (Ed):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1), 137–162.
- 18 GUPTA, Akhil, et James FERGUSON,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19 HANNERZ, Ulf, “The long march of anthropology” in Falzon, M.A., *Introduction: Multi-sited Ethnography: Theory, Praxis and Locality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Ashgate, Farnham, Burlington, 2009).
- 20 BOLTANSKI, C., *De la critique. Précis de sociologie de l’émancipation* (Gallimard, 2009).
- 21 ROULLEAU-BERGER, Laurence (dir), *Sociologies et cosmopolitisme méthodologique*, (Toulouse: PUM, 2012).  
BASTIDE, Loïs, *Habiter le transnational. Espace, travail et migration entre Java, Kuala Lumpur et Singapour* (Lyon: ENS Editions, 2015).
- 22 HANNERZ, Ulf, “The long march of anthropology” in Falzon, M.A., *Introduction: Multi-sited Ethnography: Theory, Praxis and Locality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Ashgate, Farnham, Burlington, 2009).
- 23 WEISSKÖEPEL, Cordula « Traversing Cultural sites: doing ethnography among Sudanese Migrants in Germany », in Falzon, M. A, *Introduction: Multi-sited Ethnography: Theory, Praxis and Locality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Ashgate, Farnham, Burlington, 2009).
- 24 CHANG Kyung-Sup, “The second modern condition? Compressed modernity as internalized 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0) vol. 61, N°3.
- 25 CASTEL, Robert, *La montée des incertitudes* (Paris: Seuil, 2009).
- 26 KOKOREFF Michel, LAPEYRONNIE, Didier, *Refaire la cité. Diversité et politique desquartiers populaires* (Seuil, 2013).
- 27 LI Peilin, (ed),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China Experience i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12); LI Peilin, (ed), *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in People’s Livehood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ang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4).
- 28 SUN Lip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new subjects for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Open Ear* (2008); LIU Aiyu, Crise de la confiance des ouvriers-paysans en milieu urbain, in Roulleau-Berger Laurence et Liu Shiding, *Sociologies économiques française et chinoise. Regardscroisés* (Lyon: ENS Editions, 2014).



- 29 ROULLEAU-BERGER, Laurence, *Le travail en friche. Les mondes de la petite production urbaine*, (Editions de l'Aube, La Tour d'Aigues, 1999).  
ROULLEAU-BERGER, L. "Circulation, disqualification, autonomie des migrants en Chine continentale" (*Espaces, populations et sociétés*, 2009, N° 3).
- 30 ROULLEAU-BERGER, Laurence, "Grammaires de la reconnaissance, individuation et ordres sociétaux", dans Caillé, A, *La quête de reconnaissance: nouveau phénomène social total*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7).
- 31 CEFĂÎ, Daniel, *L'enquête de terrain* (Paris, Ed. la Découverte, coll. "Recherches", Série Bibliothèque du MAUSS, 2003).
- 32 ROULLEAU-BERGER, Laurence, "Grammaires de la reconnaissance, individuation et ordres sociétaux", dans Caillé, A, *La quête de reconnaissance: nouveau phénomène social total*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7).
- 33 WATSON, R, Continuité et transformation de l'ethnométhodologie, M. De Fornel, A. Ogien, Quéré: *L'ethnométhodologie. Une sociologie radical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1).
- 34 FASSIN Didier and LEZE Samuel, *Moral Anthropology.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13).
- 35 LIU Neng, "AIDS, Stigma, and Social Discrimination",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006).  
COSSEE, Claire, MIRANDA Adelina, OUALI Nouria, SEHILI, Djaouida, *Le genre au coeur des migrations* (Paris: Petra, 2012); LIU Shiding, Three Type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grant Workers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Logical Consequences (2012) in Roulleau-Berger and Li Peilin, *European and Chinese Sociologies. A new dialogue* (Brill Publishers Leiden, Boston, 2012).  
SHEN YUA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eijing: Social Fi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36 DEBOULET, Agnès, Villes convoitées et inégalités, *Idé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2012), N°167.  
COUSIN, Bruno, "Ségrégation résidentielle et quartiers refondés. Usages de la comparaison entre Paris et Milan, " *Sociologie du travail* 55 (2013), 214–236.
- 37 EHRENBERG, Alain, *La fatigue d'être soi* (Paris: Odile Jacob, 1998).
- 38 FASSIN Didier, *Le gouvernement des corps* (avec D. Memmi),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4).
- 39 MURARD Numa, LAE Jean-François, *Deux générations dans la débîne. Enquête dans la pauvreté ouvrière*, (Paris: Bayard, 2011).



- 40 ROULLEAU-BERGER, Laurence, réédité en 1993, *La Ville-Intervalle: jeunes entre centre et banlieue*, (Paris: Editions Méridiens Klincksieck, 1991).
- 41 BESSIN, Marc, BIDART, Claire, GROSSETTI, Michel, Bifurcations., *Les sciences sociales face aux ruptures et à l'événement*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0).
- 42 TARRIUS, Alaina, vec MISSAOUI, Lamia, Les nouveaux cosmopolitismes. Mobilités, identités, territoires, l'Aube, La Tour d'Aigues (2000).  
TARRIUS, Alain, La remontée des Sud Afghans et Marocains en Europe méridionale (Ed . de l'Aube, La Tour d'Aigues, 2007).
- 43 BECK, U, *Qu'est-ce que le cosmopolitisme?* (Paris: Aubier, 2006).
- 44 ROULLEAU-BERGER, Laurence, *Migrer au féminin* (Paris: PUF, 2010).
- 45 DEMAZIERE, Didier, SAMUEL, Olivia, *Inscrire les parcours individuels dans leurs contextes*, Temporalités, n°11(2010).

